

中国 2019 年前后的房地产、中国反腐败以后还有出路吗？垄断国企将走向何处？

张 洞 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前言】。下面集合了最近作者在博客上发表过的 3 篇文章。1*。也谈 2019 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房地产。2*。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腐败太难太难，以后还有出路吗？3*。中国现在发展的国有垄断企业，今后是否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可以讨论和批驳。在科学上，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题目是不是危言耸听，愿人们能认真思考。
[Academia Arena, 2010;2(3):15-31] (ISSN 1553-992X).

关键词：中国；房地产；腐败；垄断；国企

第一篇 也谈 2019 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房地产

==看润涛阁先生的大作“2019 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房地产”后感==

【1】。润涛阁先生的大作‘2019 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房地产’中，有许多正确而独到的见解。使人佩服。根据中国人口的变化规律，由于现在人口在 2019 年之前保持相对的稳定，大约在 2019 年之后人口开始下降。会造成城市中房地产业不再风光，空房会越来越多，价格会越来越下降，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2】。至于从 2009~2019 这 10 年间，城市中的房地产是否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使农民大量进城工作而造成城市中的住房供不应求、造成房价的暴涨呢？这是值得商榷的。这要取决于以下的几个条件：

2-1*；现在城市中的人均住房面积究竟达到多少？由于对城市总住房面积和每年新建住房面积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公布数字，很多假大空的数字都是为了忽悠老百姓，前后矛盾，是在为房地产大腕制造天价房作广告宣传的。因此，只能采用一些学者们推算出来的数据作一些估算。根据资料，在 1978 年，全国人口总数是 9.6259 亿，城镇人口 1.7245 亿，城市化率为 17.9%。到 2008 年，总人口 13.273 亿，城市人口 6.06 亿，农村人口 7.213 亿，城市化率为 45.6%。估算 2009 年，总人口 13.3414 亿，城市人口 6.28 亿，农村人口 7.0614 亿，城市化率为 47.07%。

表 1 未来 50 年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摘自《南方房地产》2005

年份	1997	2000	2010	2020	2050
中国总人口规模（亿人）	12.36	12.9	14.00	14.90	16.00
城市人口规模（亿人）	3.07	4.13	5.60	7.45	11.2
为 1997 年城镇人口倍数	----	1.1	1.51	2.01	3.03
城市化水平	30%	32%	40%	50%	70%

另一资料，『即 2011 年，中国城镇住房面积将达到 256 亿平米。届时，我们按照 6 亿人在城市居住计算，每人可使用的面积将达到 42 平米。』^[1]

另外资料：『在全国每年新增的 1800—2000 万的城镇人口中，约有不到 500 万的处在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口，是由于城市规划的扩充而“由农民变市民”的，他们每年“带到”城市的新增住房面积最多也就 1.5 亿平方米(由于农村变城市后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改造拆迁，另外农民自身的原有住宅也有一个改造的问题，所以这些“带房新市民”的“有效住宅”人均以 30 多平方米计算。』

从上面可以得出的估算数据如下：**假设 2010 年，全国人口达到≈14 亿。城市人口≈6.5 亿，城市化率≈48%。城市人均住房面积≈40 平米/每人。**那么，一个独生子女的 3 口家庭住房一般≈80 平米的 2~3 居室已足够了。由此可见，城市的住房空置率约大于 30%。这与许多实际的调查资料相符合。一些拿房地产商好处的学者和官员说：『2008 年，北京商品房北京空置率高达 16.64%，空置面积消化周期达 12.92 个月，高居全国榜首』。这可能都是骗人的鬼话。北京的现实情况是，除了民工挤在一间房间之外（而民工是不算城市户口的），现在北京和其它城市还真难找到一家 5~6 口人挤在一个 2~3 居室的套间的。而有 2 套以上豪宅的官员多不胜数。既然城市 6.5 亿人口有高达 1/3 的房屋空置率，因此，房地产商才雇佣各式各样的托儿卖房。**房产现在已过剩，就是说，从 2010 年起，到 2020 年止，即使城市不再建筑商品住房，10 年再从农村再迁入城市 1.5 亿人口，也可以有房子可住（当然不是指豪宅，而是指可供一家 3 口住的 60~80 平方米的经济房）。**即使按照某些替房地产大款代言的学者所说的 16.5% 的房屋空置率算，城市也可至少在 5~6 年之内不盖新房，而能满足每人 25 平米基本住房要求，这里还没有包括房地产商所滞留在手中而未开发的大力土地。

现实是，『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数据令人寒心：中国 85% 的家庭无能力购房。』^[5]而几乎所有城市的居民，除民工之外都有房住，这说明城市中的房屋空置率，特别是高价（级）房的空置率是非常高的。大款和高官因为政府不收物业税而大量囤积房产作为私人财产。郎咸平：『近几个月，代表中国目前主流购买力的中高档以及写字楼盘的租金不断下跌，意味着刚性需求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的房价猛涨是资金推动型**，其内在原因就是对于企业家而言，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转而从实体经济投身购买楼盘。』^[6]其实，更多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中，即官员大款从宽松的银行贷款中所得的钱投资到房市中的结果。

2-2*；如果政府将现在的政策不变的延续到 2020 年，不大力扶植私人中小企业，就不可能每年将 1,500 百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注意：城市人口每年也要解决约 1 千万人就业）。从上面可见，1978 年，城市人口≈1.7 亿，到 2010 年，城市人口≈6.5 亿，32 年增加了 4.8 亿，**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00 百万。**而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1,800~2,000 万也是有点夸大其词，可能是近几年才有的现象。但是，自 2008 年美国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产品大量滞销，造成沿海有关工厂大批倒闭和减产，使工人大批失业。美欧的消费者由于失业和半失业而可能会永远捂紧荷包。这些工厂如不升级或转型，就只能永远关闭。**中国既无中小型私人银行，这些工厂又得不到国有银行刺激经济的贷款而升级或转型，很多已经倒闭，为倒闭几乎都奄奄一息。国家 2009 年约 10 万亿元的巨额贷款几乎都给了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估计大约有 3.5~4.5 万亿的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吹成了现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要知道，10 万亿元的巨额贷款比 2008 年的 1/3 GDP 还要多一点呢。

由于国家刺激经济的贷款几乎没有用于扶助城镇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就成为一句空话。大批民工们只能靠吹大的房地产泡沫和国家对产能过剩的基建投资才暂不失业。按照政府现有一贯的“劫贫济富”政策，**现在还在继续更加卖力地搞“国进民退”**，挤压私人企业，许多高官跑到井冈山顶礼膜拜，是不是又打算走向改革开放前时代？这就表明，**如果将现在的政策不变的延续到 2020 年，不可能每年将 1,500 百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何况，也不可能连续 10 年每年以 10 万亿元发放贷款吧。一旦房地产泡沫和其它产能过剩的产业泡沫因紧缩贷款而破灭，会造成金融经济危机的风暴的。中国的社会经得起吗？迪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另一次更响亮的警钟。

2-3*；现在的高房价与供需关系毫不相干，是政府的巨额贷款吹起来的。“随着十余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也不断加深，地方官员的财产也在逐步累积，一个科长几套房、处长十几套房、市长书记几十套房是普遍的现象，人民赋予的公权也彻底沦为谋私的工具。在 2008 年与 2009 年的房产冷热交替中可以发现，类似于中石油团购一样的政府机关团购充斥了全国楼市的每个角落，他们以难以解释的 4~5 折低价买入，按市场价格售出，从中谋取无数的暴利，就连普通公务员也是有了钱就投资房产，一个人几套房的公务员不用查，已比比皆是，这群人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炒房团的骨干与中坚力量。”^[2] 可见，住房的空置率是很高的。而且，现在的房地产商手中都囤积着大量土地不盖房，以便高价倒卖出去。

2-4*；为什么政府会一贯的实行这种“劫贫济富”的政策呢？因为政府财经的决策权掌握在许多贪腐高官和国有垄断企业官员的手里，就是人称的特殊利益集团人的手里。吹大房地产泡沫只对贪官们有利。房地产泡沫是现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恶性肿瘤。^[3] 他们的贪腐（80~90）%都与房地产有关。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之害，成为人民公敌。最近，中国水、电、煤气、食物等价格的飞涨就是高房贷投资造成的通货膨胀。只有刺穿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才能走上正常持续发展的轨道。刺穿房地产泡沫其实是很简单的，用收取 1/(50~100)房价的物业税的收入买下大部分或者全部现有的经济适用房，作为市政府的不许买卖的永久财产，然后减或免租转租给无房住者和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以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这是所有美欧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低收入房”的办法，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和扶植社会“弱势群体”一项好政策。但是，刺穿房地产泡沫会受到各级官员的极大阻力，因为极大多数贪官的大部分非法所得都是房地产，一方面房产可以作为他们隐秘的不上税增值的巨大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用 N 座私密房产包养 N 奶，这也是他们的隐秘。所以政府征收物业税就是直接暴露他们非法财产的有效办法，是最切实可行的反贪措施。

【3】。几点看法：3-1*；无论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工农、地区、城乡 3 大差别，以使（80~90）%以上的农村转变为城市。中国在 2010~2020 之间人口大约稳定在 14~15 亿之内，如果上天保佑，中国在这 10 年之内，共产党的领导在不出大乱的情况下，能够排除各种困难和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阻扰，每年将约 1500 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那么，到 2020 年，中国城市总人口将达到约 8 亿，而农村人口尚有 6 亿多，城市化率约为 55%。虽然成绩巨大，但离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中国现在实际上已在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到 2049 年，人口是否会降低到 7 亿，不得而知。

3-2*；对经济率先（假）复苏的中国而言，对充溢乐观情绪的中国房地产业而言，迪拜神话破灭的这瓢冷水的确来得太及时了。有许多喷青陶醉在美国电影《2012》内的“中国拯救世界”的迷魂汤中。有一种声音在中国天空震荡：“中国拯救了世界，房地产拯救了中国”。只要看看 G20 和联合国大会后，超过 55 国对中国大打贸易战，就可知傻乎乎的中国又“被国际忽悠”了。中国用 10 万亿元银行贷款保住了 2009 年的鸡底屁超过 8%。10 万亿元相当于 2009 年总鸡底屁总值的 1/3 呢。就是说，这是全体中国人加班白干了 2009 年中的 4 个月换来的。请用不灌水的脑子想一想，在一般情况下，一年中多干了 4 个月应该使该年的鸡底屁至少要增长多少？不错，10 万亿元对房地产和其它项目的投资救了 2009 年的中国。但这种刺激经济的模式今后年年能够继续吗？如果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被推延到 2012 年破灭，像迪拜一样，谁来拯救中国？而 2012 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中国政府极难连续在 2010，2011，2012 年，每年再以 10 万亿贷款发放出去，像 2009 年一样。

3-3*；郎咸平说，中国资产泡沫如爆破，将造成 2010 年世界经济危机。近期水、电、油以及铁矿石等价格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郎咸平表示，在金融风暴过后，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友善，在汇率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贸易制裁、贸易壁垒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在提醒中国的企业在 2010 年要格外的谨慎。^[6] 现在许多学者和高官们故意过分地夸大“北京共识”的作用，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的流毒。经济发展有其规律，意识形态和政治不能过分干预。中国 2009 年用 10 万亿元贷款刺激经济，使中国躲过了 2009 年的金

融经济危机，但这只是一年的特例，不能常态化，长期化，因为今年的刺激经济产生了更多滞后的产能过剩和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为明后年埋伏下了更大的危机。

3-4*；现抄录一段有关高房价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看了会使人震颤。『如今出了一部电视剧叫《蜗居》，有评论说《蜗居》讲的是“一个残忍的性掠夺故事”，“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性资源正向权钱阶层加速流动。”“这种性资源的掠夺，不仅造成社会道德感的缺失和正义感的沦丧，也导致性泛滥与性匮乏的共存，极少数人占有过量性资源，而陷入性贫乏和性短缺的群体不断扩大。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观察网汪雷）』^[4]

3-5*；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12月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此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12月3日，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司长**王炳南**预计全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左右。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则概括道：“今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房地产业最辉煌的一年。**”只要稍动脑筋分析一下上述3条最近新闻，就可以得出以下惊人的结论：**1***。今年是房地产业最辉煌的一年。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元。为什么？因为今年政府刺激经济的贷款10万亿元中的约50%，即约5万亿元流进了房屋产业，因为房地产业今年并没有新建较多的新房，所以5万亿元贷款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现款落进高官和大款的腰包，他们总不可能像文强一样，将所得的大量赃款封存好后埋进池塘或夹墙中吧，于是只有买高价房这一着了。这就造成了今年房地产业异常的繁荣。**2***。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是，这房地产中最辉煌的的交易中，绝大部分一定是高档房，绝不是经济适用房。**3***。**6万亿元的房屋销售总额也只能买1~4百万套高级住宅，却占据了全中国13多亿人口销售总额的一半，这说明普通老百姓在“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3座大山压力下，每人每年平均的消费额还不到5000元。这种极大地贫富悬殊是造成中国现在“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的根源，亦是社会群体事件产生的根源。**

3-6*；由于2019年以后，全国总人口量的下降，城市人口的下降应该比农村更快，因为那时城市人口已多于农村，而出生率较农村低。并且老年人口由于寿命的增长而增多，城市对青年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加上城市房价的下降，这可能更有利于加速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可见，**从2010~2019这10年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充满危机。但只要党政高层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制定的政策措施得当，也就会充满转机，转危为安。**

3-7*。但是，现在的温家宝政府，在2009年超过10万亿的银行贷款中，有约5万亿落进了房地产市场，成为国有企业高管炒房地产的本钱。『属于央企的中化集团，旗下中化方兴投资管理公司，就经常以“大款”作风在土地拍卖会上举牌，对地价是否符合市场价格毫不理会，今年六月备受瞩目的北京广渠路15号地拍卖如期举行，中化方兴以40.6亿元拿下地王的大款作风，甚至连地产商SOHO的董事长潘石屹也为之咋舌。』^[6]这不是个别的事例，而是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从而造成了今年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高房价排斥农民进入城市，排斥农村的城市化。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迟早的事，绝不可能被推延到2019年之后。这就是说，想再用房地产来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0年，可能只是一种幻想。房地产泡沫被吹得越大，破灭时产生的金融危机也越大。**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内需，也就是大力发展私人中小企业，特别是私人银行。由此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和城市的房地产业。这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现在却反其道而行，用搞房地产泡沫来搞城市化，这和从前用“大炼钢铁”搞工业化是同一个思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完====

参考文献：

- [1]。『天涯杂谈』天涯网友恳请国务院公布全国城市人口和住房面积。
作者：宥渠小生 提交日期：2009-9-27 14:25:00。
- [2]。韩令国：中国经济必将崩溃在高房价下。www.wenxuecity.com, 时事述评。09-11-11 17:54:41
- [3]。张洞生：试论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的房地产泡沫。wenxuecity.com/diary.php?c_lang=big5...200910
- [4]。《蜗居》社会学：性阶级与性阶级斗争。信源：英九博客 | 编辑：2009-12-03 |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 [5]。数据令人寒心：中国 85%的家庭无能力购房。新华网 于 2009-12-07 14:13:19
- [6]。总算闹明白了：中央救市 4 万亿元部分竟是央企炒地本钱。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华盛顿人 于 2009-12-17 08:42 编辑 www.backchina.com

第二篇 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腐败太难太难，以后还有出路吗？

【一】。人的欲望有“善”和“恶”的两重性。反对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 法国哲学家)曾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欲望有两重性，或者说，有两面性。性善或性恶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矛盾统一体，每个人的善/恶比相差是很大的，其善恶的内容也不一样。对一个人来说，其善/恶比也不固定，会随环境和经历的改变而会改变。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互助合作的发展进步是人性中善的发扬。个人犯罪、损人利己、贪赃枉法、腐败堕落等是人性中恶的膨胀。所以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就是人性恶的一面膨胀的结果。然而，可悲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明的发展，到现在为止，人类总的善恶比却在下降，即善/恶在减小。这就是悖论。为什么？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环境变得更紧密复杂，人的智慧和手段更是增多，所以人变得更易于掠夺和骗取别人和社会的财富。所以老子对人性恶的一面看的很透，说：“智慧出，有大伪”。一个人作好事做多了会上瘾。同样，一个人作坏事做多了也会上瘾。这就人性的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人做好事做得越多，劲头越大，越作越想做，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均如是。人作坏事也一样，从小偷（贪）到大偷（贪），越来越贪欲越大，劲头越大，绝不会满足，看看那些被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们，有谁是已经满足了的呢？他们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美国华尔街的大鳄们不同样贪婪成性吗？现代高科技的互联网使华尔街的大鳄们坐在办公室敲敲打打键盘就能诈骗到亿万财富。这符合是人性的第二定律：加速定律。贪得越多，动力越大。无利不早起。人生的过程是由一连串的循环或者震荡构成的。作善事和作坏事有类似的规律，在一个人连连作好事时，如果都适时地得到鼓励、奖赏或助力，他就会越作越好，越做越多越大，这就是人性对外界环境的共振效应。相反，在一个人连连作好事时，如果都适时地得到打击、奚落、失助，他就可能灰心不干了，这就是阻尼效应。同样，如果一个人连连做坏事没有得到外界给予的应有惩罚，而是一路绿灯，他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作坏事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就是人性的第三定律：共振定律，即一个人的人性会受强大外力的干扰而可能会有所改变，或产生倍加效应，或产生倍减效应。由上所述，可以得出有关反贪腐的以下结论：

第一；贪腐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其有利条件下（制度和环境）恶性膨胀的结果。任何制度，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独裁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欺骗贪腐，而只能减少欺骗贪腐，并使其危害降低。好制度和好环境的有效配合可大大的减少贪腐，坏制度和坏环境则助长贪腐。

第二建立有效地反对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制度，以制止权贵大鳄的祸国殃民行为。绝对的权力造成了绝对的腐败是铁律。只有上梁正，下梁才极难歪。

第三；建立透明的严厉的反贪腐制度。除了独立、公正、严格的法制外，强大的外部压力和环境是反贪腐的必要条件，如网络监督，媒体监督等。高薪养廉”实质上是对贪腐者的屈从，是公开为腐

败开道，为贪腐正名。反贪既要看到产生贪官污吏的环境和其财的源头，也要看到他们财的出处。现在，中国(80~90)%贪腐都与房地产有关。90%以上的贪官都包二（多）奶、情人、小蜜。N座房产是他们包养N奶的必要条件。因此，第一；征收房地产税是暴露贪官受贿的最有效的措施。第二；应该制定条例，重赏揭发检举贪官的二（多）奶、情人、小蜜们，因为她们少数是共犯，多数是受害者。重赏之下，必有勇妇”。这可能是一条有效地反贪措施。由于人的恶性欲望（贪欲）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把它作为腐败产生的根源，而应找出让贪欲得以恶性膨胀的制度性根源，这样才能找到纵容腐败的制度和环境。贪官们贪得越多，冲破制度约束的欲望和能量也越大，办法也越多，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也越大。

【二】。中国滋生贪腐官员的温床：国有垄断企业，暴利的房地产业，政府的基建投资

《1》。官商一体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高管是滋生贪腐的重要温床。中国近15年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和买办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即特殊利益集团。集团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和银行的总裁、董事长、总经理等，他们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主要阻力。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现在0.4%的富人占有全国GDP的70%的财富。他们都位居政经高位。其中有许多贪腐官员已成为黑社会的代言人和保护伞。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和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较量。决定胜负的却是中国共产党

国有企业中的高层是形成现今中国权贵买办垄断资本家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成员，其中的一些中上层人物是买办卖国贼，其中不少人的发家都靠暗中向外国公司或外国出卖政治经济利益或机密情报。已揭老底和被处死的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发生在著名跨国公司针对中国官员的“行贿门”事件及从商务部的周京毅案到各省市有关部门的涉外腐败案件，那就会明白，官僚和国企高层是把这些利益通过公开甚至合法（通过立法）的手段送到国际寡头财团面前的。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指责美国公司向中国中石油等3大公司行贿，中国政府调查后，否认了美国的指责。老百姓要相信谁呢？这个集团中有许多人可能是裸官，和陈水扁杨秀珠一样，将大量非法获得的财产转移到了外国。因此，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蛀虫。由于国企高管往往是自定薪酬等原因，难以控制他们的个人工资和红利总量。

《2》。（80~90）%的贪官都与暴利行业的房地产，黑煤矿等有权钱交易

『随着十余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也不断加深，地方官员的财产也在逐步累积，一个科长几套房、处长十几套房、市长书记几十套房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民赋予的公权也彻底沦为谋私的工具。在2008年与2009年的房产冷热交替中可以发现，类似于中石油团购一样的政府机关团购充斥了全国楼市的每个角落，他们以难以解释的4~5折低价买入，按市场价格售出，从中谋取无数的暴利，就连普通公务员也是有了钱就投资房产，一个人几套房的公务员不用查，已比比皆是，这群人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炒房团的骨干与中坚力量。』^[2]

官员的贪腐（80~90）%都与房地产有关，都受贿豪华住宅。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之害，成为人民公敌。高房价的泡沫和暴利扼杀和排斥私有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只有征收物业税和国有银行不给购第2套房这贷款才能有效地刺穿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才能走上正常持续发展的轨道。

《3》.政府的基建投资。公共财政投资问题很多，官员争夺和利用投资与商人和黑社会勾结，进行权钱交易，是滋生官员贪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温床。也造成真正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资较低，在世界各国中排在后面，导致民生难以好转，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并且拉大了政府和民众的矛盾。

《4》.共产党的一贯封建特权思想和制度。一党专政本身就形成官员的特权。使官员能够“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当官员无阻碍地利用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并进行钱权交易时，就走上了贪腐之路。

《5》。结论：1*。这就是反腐败太难太难的原因，因为腐败产生于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层，这是中央部级官员贪腐的主要来源。地方高中层的腐败绝大多数产生于房地产、暴利的煤矿和各种矿、基建投资，乡镇小官员的贪腐来源于对底层民众的强行摊派和收费的压迫剥削。这就是说，中国从中央到省市县再到基层的乡镇都遍布滋生贪腐的温床或曰土壤。但是仅有土壤，种子也不会生长壮大。而在共产党“一党专政”条件下的“党大于法”和各种特权制度的“姑息养奸”才使得贪官污吏可以“有恃无恐”、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这就造成了下面有中国贪腐特色的5化。2*。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除恶反腐最多只能解决地方黑社会、大款与政府官员勾结形成“官商黑”“三位一体”的问题，而这只占贪腐中的小部分。国有垄断企业和暴利的房地产中滋生的贪腐却占据贪腐的大部分，而这是薄熙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如果没有中共中央高层出手，将打黑除恶反腐推广到全国，中国的反贪腐要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是太难太难的。3*。薄熙来在打黑除恶反腐中取得的初步胜利，使中国广大民众看清了，黑势力及其保护伞可能已渗透至中国各层级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公检法系统、学术和媒体界。因此，薄熙来的打黑反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前进中不可绕过的一道坎，关系中国的前途。已经取得的成绩开创了今后反腐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薄熙来的打黑反腐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中国现在官员严重贪腐的5化特征及其成因

《1》。腐败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性：现阶段中国最大敌人是贪官污吏。薄熙来说，贪腐现在已经成为党政的“致命伤”。这可能是薄熙来从重庆打黑除恶反腐所暴露的和未能公开的实情得出的结论和感慨。腐败使“官民对立”、“官兵对立”、人心涣散，使民众淡漠对抗外敌外侮的意志，使贪腐官员容易被外敌收买，前伊拉克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全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就是例子。戴旭：『腐败问题也会加速我们外部灾难的到来，现在我认为我们的很多官员已经腐败到极端无耻、无边界的程度，这会导致我们外部的危险加速到来。重庆不是在打黑吗，我要问一个问题：其他城市比重庆白多少？我们现在的国民意识，不仅是很多官员腐败，人民也腐败。』

有人说，各国都有官员贪腐，有的国家还很严重，没什么可怕。由于国情不同，贪腐对各国的危害性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台湾的主要矛盾是“统独”，又有一定的民主和法制。印度85%的人信仰印度教，能够忍受严重的压迫剥削而不反抗，又有一定的民主制度。俄罗斯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和民主制度。因此，在这些国家的贪腐绝大多数往往是以“权钱交易”和“愿打愿挨”的方式进行，所以难以引起社会的大动乱。而中国则不同，既无民主法制又失效，又无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而中国老百姓既无宗教信仰以支持其忍让，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熏陶，具有很强的反抗性。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打死总经理事件，新疆民众游行要求王乐泉下台事件等等，都说明现在全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压蒸锅，随时都有可能爆破。

现在买办官僚及其依附的精英充斥全国，南海是中国的领海，那里有上千口美、英、俄的油井，却没有一口中国的油井。中石油宁可跑到非洲打油，也不愿、不敢在南海打油，以维护中国的领海和权益。另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

《2》。第一；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贪腐的高层化，或者党政高层对贪腐的容忍和保护。叶永烈说：“中国现在官员的贪腐的特征已成为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和黑帮化”，这4个官员贪腐的现代化已经压迫得无权的平民百姓透不过气来。特别是整个公检法系统几乎完全烂成贪腐官员和黑社会的保护伞，再加上不少贪腐官员与大款和黑社会勾结成“三位一体”。最严重的其实不是叶永烈的4化，而是第五化，即贪腐的高层化，或者党政高层对贪腐的容忍和保护。这就是中共17届4中全会仍然通不过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原因。这才是薄熙来心中所想而没有说出来的“贪腐已成致命伤”的原因。这就是中共20年来“越反越贪”和“前腐后继”的原因。

第二；中国现在“以官为本”的政治制度来源于共产党一贯顽固的“打天下，座天下”的封建家族特权思想，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毛泽东起，就搞封建官僚特权，行宫遍中国，专列到处跑。毛泽东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现在发展到大小官员几乎都是“和尚打伞，更加无法无天”，贪污腐败、二奶、N奶、买处、官商黑勾结一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三鹿奶粉案的结果是杀了2个无知的制作三聚氢胺的农民。赵紫阳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六四中答应“反贪腐”从查自己的子女开始。这触到了当时元老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和新贵李鹏的敏感神经。不过当时元老们的太子太妹们还不过是利用特权占据党政中层捞些油水而已，不像现在形成一个个千万、亿万的大家族，互相联姻，勾结在一起。所以，**邓小平的重要错误之一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地容许自己和其它元老的子女利用特权牟利。**江泽民上台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和其家族“闷声发大财”的需要，拉帮结派，一方面培植亲信和跟班，一方面又向太子太妹们输送利益和权力（党政军高位），并封给他们“先进代表”的桂冠加以保护，以拉拢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家族利益。**胡锦涛2002年裸身上台，没有自己的班底，江泽民搞阴谋诡计硬将自己的大批跟班塞进胡锦涛的左右，虎视眈眈，使胡动弹不得，只能“空话治国”。**高喊“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而无所作为。于是形成了现在的权贵和买办为首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及其代言人占据党政军高层，掌控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决策权。**『中国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直白点说，就是以特殊的权力或优势，掠夺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集团，他们获得的“特殊利益”，不仅是利润的最大化，还从资源的占有、权力的操纵、舆论的玩弄，一直到司法的护航，无所不有。』^[3]

《3》。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强大的外力，即上层压力。只要党政最高层自身清白，坚决公正地反贪腐，将自己、家族和派系的利益置之度外，严惩贪腐，贪腐就并不难清除。

第一香港、新加坡两地“管住权力”的经验很简单，那就是严刑峻法，从严治吏。以新加坡为例，它不但首创了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的提法，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首先，**法律对权钱交易的认定极其严苛，公职人员只要收受与政府机关或公共机构签约人或其代理人的报酬，不管是否为对方谋取利益，也不管收受好处多少，都会被认定为受贿行为。**对“收取报酬”的范围规定极为宽泛，既包括金钱、礼物、证券和财产，也包括信息、服务、恩惠和许诺等。其次，**在证据上采取有罪推定，**如果发现官员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即可作为贪污受贿的证据。再次，在量刑上实行逐项量刑、合并计算的刑罚制度。^[4]

这些法规都很简单，也易于操作。移之于中国，绝对足以震慑贪官。对比中国现状，不难从中找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屡治不愈的奥秘。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拥有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强大能力，更拥有通过权力影响政策、法律的制订，扭曲其执行，为自我利益“保驾护航”的强大能力。因此，“无罪推定”在中国被最多运用在职务犯罪上，美其名曰“贪官也应有人权”；在许多国家可以相比，贪污受贿罪加一等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在中国最高刑期仅仅10年（1年前还是5年）；虽然公众千呼万唤，官员财产公开法案就是不出来……**法律对特殊利益的呵护如此无微不至，它们焉得不发如雨后春笋？**^[4]

第二；中国当前的反腐必须跟薄熙来一样，从打黑除恶反腐开始。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反腐的初步胜利已经证明了现在在全国打黑反腐的必要性、迫切性、可行性。说明在全国打黑反腐是“不为”的问题，而不是“不能”的问题。在全国公检法系统已经普遍贪腐、变成黑社会和贪官污吏的保护伞的状况下，只有从打黑除恶反腐做起，才有可能使反贪腐逐步深入，而后走上正道，以便最后使公检法成为清廉、独立、公正的系统。这是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4》。贪腐是从特权中滋生出来的。今日中国与上世纪70年代前的香港较类似。当时香港，以权谋利也无所不在：救护人员接病人到医院要“茶水钱”，消防员开水龙头救火要“开喉费”，住院病人领取开水或便盆要打赏医院护工。弄得天怒民怨。这一切乱象，却在短短几年间，由于一个矢志澄清吏治的港督而被改变。^[4]

第一让公权和私权独立地获取自己的营养。被多数国人误读了的新加坡“高薪养廉”，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公私分明的例子。表面上看，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真正拿

100 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 30 人左右，而且，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上班开自己的车；他们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可见，新加坡政府之所以清廉，不是因为“高薪”，而是因为“公私分明”。这种公私权力界限的清晰划分，不能仅仅停留于制度条文上，更要体现在实际操作中。

第二；中国最大的特权来源于“以官为本”，“党大于法”，进而形成“权大于法”。从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到现在的“稳定是硬任务”，将官员变成维护社会稳定（维稳）的工具，说白了就是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工具，所以中央最高层现在需要官员维稳而容忍其腐败。这就是薄熙来的打黑除恶反腐不能在全国推广的原因。反腐败搞隔靴搔痒的结果是贪腐官僚对媒体的控制反而变得更加严厉，强化对媒体控制，对民众的维权和上访严厉打压，各省的驻京办事处私设牢房关押上访民众，有些办事处还奸污女访民。

第三；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高层化的贪官们已经结成巨大的贪腐网，他们互相勾结、联姻、共用情妇，并与大款黑社会结成“三位一体”，互相保护，共同压迫剥削广大民众。造成了全国普遍的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与民众对立”。如果贪腐继续发展下去，会造成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现在纵容贪腐和强压民众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策不是治国的政策，这种高压是难以持久的。

《5》。现在的党政高层忙于权斗，互相拉帮结派，无心无力管贪腐，还纵容贪腐。胡锦涛不是核心，原来又无班底，需要铁杆支持。支持者就要分享权力和利益，而他们的屁股可能原来就不干净，或者后来变得不干净。老 J 是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和贪腐高官的总后台。两派为了其集体的利益既斗争，又搞利益的平衡和交换，对派内的贪腐加以保护，对派外的贪腐只好听之任之。比如黄菊就是例子，他的秘书妻子亲戚都贪腐，只有他自己一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自圆其说。更坏的是为了拉拢地方官员投靠自己而放纵其贪腐。现在公检法烂掉了，靠不住，搞出个中纪委，中纪委又管不了政治局成员，办案就只能有选择性、符合派系斗争的利益和平衡的要求了。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是靠买官上来的，那卖官者就是幽灵？现在四川的文强是被查出的贪腐最高官，他在四川贪腐十几年，就没有给他的某位上级打点和上贡？这说明现在中国贪腐之所以猖獗，是根在党政高层。是高层“不为”，而不是“不能”。

高层家族成员的把柄可能成为绑架高层的人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的封建官僚特权社会，父母将子女看到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姬鹏飞因为保不住出卖国家机密的儿子姬胜德的命而自杀。邓小平可以枪毙朱德的孙子，但能管住自己所有的子女吗？陈云的女儿最近回忆作为“中国的财经大管家”，死时只有 2 万存款。这些当然无可置疑。但是，他们这个家族是否与其父辈一样呢？朱镕基本身无疑一个清官，他能保证他的属下，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也能跟他一样，不贪腐、不利益输送吗？我相信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本身没有贪腐，可他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一些正气和正义感呢？是自己无能保权位、还是有错误被人抓住、还是家族成员有把柄被人掌握？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元老子女都跑到美欧学财经，镀金几年之后，在国外就因被外国财团看中其特殊身份，拿高薪。他们之中有几个不给外国公司输送情报利益的？回来摇身一变，就是行长、总经理、董事长、总裁、CEO 等，站住党政高位，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中的权贵资本家和买办，成为现在贪腐官员的总代表和代理人。更可怕的是，他们互相勾结、联姻、近亲繁殖，排忧解难，形成更疯狂的骄奢淫逸富二代、富三代。他们轻易地掠取巨额财富，使他们养成了贪婪的本性。他们的辫子可成为父辈高管被要挟的把柄。各派都因此而无反腐的真心是造成中国现在贪腐猖獗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中国今后反贪腐形势的 5 种出路

《1》。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胡锦涛不是“核心”，受制于政治局常委中的江派，没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反腐（至于他自己是否有决心反腐尚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的打黑除恶反腐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有普遍的意义。如果能在他的坚持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大下，能逐渐得到全国广大民

众的支持和中央高层的表态支持，而扩展到全国各省。这样，反腐日后就可能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出现和完成。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反腐过程，有可能中途夭折。

《2》。即使如上所述，中国现在的特色的体制、制度和环境造成了上面有中国特色 5 化的贪腐状况，难以清除，但也不是不能清除。正如以前的香港和新加坡一样，只要党政最高层有足够的权威—即在政治局和常委达成共识，本身公正廉明，无懈可击，而有决心反腐，那 5 化的贪腐还是可以清除的。特别是，如果老江在 2012 年前荣归八宝山，形成树倒猢猻散，胡温可能放手打黑除恶反贪，以收复民心，为建立“和谐社会”做些实事。

《3》。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在 2012 年届满前仍然“空话治国”“无为而治”，官场派系恶斗，上级管不了下级。官员假大空话满天飞以忽悠民众，却互相勾结以“闷声发大财”。

就是说，如果现在的党中央不能如上 2 条中之一进行反腐，那就只能寄希望于 2012 年的 18 届的中国中央政治局。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劳动，多少体会到底层民众的疾苦。上无老，下只有独生子女，家庭利益链短，包袱少。比如，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李源朝，汪洋，仇和等等，有助于他们中之一些人施展其政治智慧才能和抱负。不象从前的许多元老大家族有一大帮太子太妹需要照顾提拔和委以重任，使他们为了家族的私利而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当腐败官僚买办和大款的代言人和保护伞。18 大中已经没有老 J 的跟班了。而胡锦涛可能作为军委主席与习等的利害冲突不是很大，也许胡对老 J 还可乘机出口恶气。因此，我觉得没有太多包袱的 18 大中央领导班子，有可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施行一些新政，如打黑反腐，给社会减减压，如扩大一些党内民主，健全保障社会民众的福利制度等。但愿如此。

而且，又由于新 18 届政治局一定会面临国内外许多重大的危机，如美国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等。因此，18 大的中共中央在危机面前，只能从反贪开始，提振民气，这是赢回民心的最佳途径。有了民心，就能克服危机，转危为安。

《4》。同时，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在 2012 年届满前仍然只能“空话治国”“无为而治”，反过来将使特殊利益集团会更加疯狂，『今年以来，与特殊利益集团相关联的争论、事件，可谓层出不穷，遍地开花，从地方政府大开涨戒，从水到电等公用事业大加价，到垄断集团玩弄油荒、气荒之术，逼宫涨价；再到巨型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炒地，“地王”频现，最后是竞争性行业中，出现了“国进民退”潮。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翻云覆雨。』^[3]

“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现在，在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得不到政府和民众阻扰的状况下，他们贪婪成性的欲望必然会更加恶性膨胀，当他们弄到天怒人怨、党和政府危机四伏时，也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之时，到那时，“反贪腐者，得民心，得天下”，自然会有顺应民意而有远见、有智慧才能、有政治理想的党内高层集体或者领袖出来收拾他们，正如从前毛泽东邓小平所作的一样，也正如从前的香港和新加坡所作的一样，谁不愿意抓紧“大好时机”一跃而以成为“转危为安”的英雄人物呢。

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 18 届党中央成立独立于政治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薄熙来任书记，取代现在的中纪委，一方面使共产党“依法治国”，从专政党转变为执政党，一方面严厉公正的反贪腐。这样，我想，共产党高层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时间不会延续到 2012 年的中共 18 大之后太久的，因为中共 18 大的政治局已经没有江泽民的贪腐的跟班了，而老江本身也可能力不从心了。中国的转机仍然取决于政治老人的生命，这也是中国的特色、无奈和可叹之处。

《5》。如果 2012 年的中共 18 大之后仍然继续现在被特殊利益集团操控的路线，不反贪腐，让特殊利益集团继续他们的好日子。人民对腐败的忍耐力不是无限的。那么，党的创始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所预料到的“二次革命”就会来临，到时，恐怕共产党都可能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陪葬品。

====完====

参考文献:

[1].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 www.huxingdou.com.cn

[2]. 韩令国: 中国经济必将崩溃在高房价下. www.wenxuecity.com, 时事述评. 09-11-11 17:54:41

[3]。中国的困扰：普遍、庞大、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评社于 2009-12-02 09:35:35

[4]。改革 30 年后中国的困惑与出路：出路在壮大中产阶级？DWNEWS.COM—2009。11。4。

第三篇 中国现在发展的国有垄断企业，今后是否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从人性角度认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本质。

《1》。自从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以来，许多人，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从仇富的心理出发，往往被马克思的错误理论所误导，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国）有制，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和谐社会，才能实现世界大同。然而，前苏联东欧式、中国的毛泽东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式、现在的北朝鲜式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强有力的证明：**消灭私有制和实行单一的公有（国）制只能给社会和广大民众带来极大的灾乱，使社会退回到封建专制的极权社会，广大民众沦为贫困的失去自由的奴隶。**为什么单一的公有（国）制的社会主义会失败？因为：**1****。当人们把自己所有的财产交给公有或国有时，他就同时失去了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和能力，而只能任人摆布，而掌握大量“公共”财富的掌权者就可以随意分配、摆布和奴隶赤贫的广大民众。**2****。当一个人失去财富而只能任人摆布时，他除了向上乞讨或者争夺更多一点自由、财产和权力之外，他没有本钱、自由、能力去发挥自己的才智、爱好和理想，以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而正是这些好的自由竞争欲望推进了社会、经济和文明的进步。**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就是造成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私有制后产生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如果不从人性角度看公有制和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能互相矛盾。马克思是从他的理论和自己的贫困生活环境出发，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恩格斯从自由市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的实践中看到了私有制的自由资本主义具有极其强大的活力，历史发展的杠杆。**3****。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知识、技巧、思想、观念等都已成为无形的私人财产，只要给予适合的条件和环境，就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而这些是无法公有的。这说明了财产或者生产资料公有（国）制的本质缺陷。

《2》。可见，财产的私有制是合乎人性中的“个性自由”、“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需要的。所以**私有制的自由资本主义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主要力量**。所谓“公有”，实际上只能由许多的“个人所有”组合而成。一个没有“个人所有”的“公有”是假“公有”，实际上是为这些个人之外的别人所有。正如一个团体是由其中的所有个人所组成一样，如果没有组成该团体的所有个人，该团体就是一个空头团体。但人性有“两面性”或者说“两重性”，是“善”和“恶”同时并存。就是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只不过每个人具有不同的“善”“恶”内容和不同的善/恶比而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一个人“善的发扬”和“恶的膨胀”都需要有其适合的条件和环境。因此，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应能制定出人性中所需的“善的发扬”和限制“恶的膨胀”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所以说，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应能同时“反恶”和“扬善”。

《3》。那么，在现今的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各种欠发达的或者落后国家，都存在着各种不公平正义的、国家欺负掠夺其它国家的、少数人诈骗压迫剥削奴隶多少人等现象，其根源在那里？**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尚未能限制少数掌权者和富豪们坏欲望的“恶性膨胀”**。美国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为了军火、石油和金融集团的利益。美国 2008 年发生的大金融经济危机就是贪婪的华尔街和金融大鳄们无限制的鲸吞和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结果，麦道夫（Medoff）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现在造成社会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民对立”就是贪腐的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法无天”地掠夺、抢劫、出卖国家国民财产、资源和利益的结果，即“坏的人性恶性膨胀”的结果，当自由资本主义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时，当权力被少数人或者个人操纵和垄断时，就会引起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灾乱。因此，对**“权力的垄断”和对“财富的的垄断”才是每个国家的灾乱之源。**而**“权力的垄断者”和“财富的的垄断者”又往往是互相勾结和互相输送利益的，是排斥和反对自由**

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制的。所以每个国家只有建立有效地“反权力垄断”和“反财富垄断”的法制，才能维持其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持续地发展，才能维持其社会的基本和谐，才可能使世界免除战争的威胁。就是说，只有把政府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和把垄断资本肆意窃取和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是每个国家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4》。人性也有友爱互助合作团结的美好的一面。这种本性在人类还是动物时就储存在其 DNA 中。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分工愈细，这种好的本性就应愈发展。如果人要求自由竞争、自由发展是人性固有的个性的话，那么，“友爱互助合作团结”就是人性中的共性。二者在人性中的共存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从其财政收入、公有财产、公有资金和基金中提供全体国民所需的愈来愈多的社会福利保障，即提供每个国民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工作的基本保障。这也是合乎人性的需要的。可见，财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合乎人性的需要的。问题在于，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国情使二者有不同的内容、比例和适当的配合。

【二】。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危害社会政治经济持续发展的祸首

近 15 多年来，中国党和政府大力维护和发展国有垄断企业，危害甚大。正是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和贪腐的高官们（权贵和买办）形成了现在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肆意窃取、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和资源，造成了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的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与民众的对立”。

《1》。在改革开放的前 15 年，绝大多数人为了脱贫和解决温饱，他们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冲突不是很大。但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 4000 美元/人年，每个人都有财产和利益需要保护，形成了与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直接冲突。周瑞金：『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上半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 500 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2》。近 15 年中国经济不太正常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和买办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集团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总裁、董事长、总经理和党政高官家族等，他们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 20 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 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 500 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 5000 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现在 0.4% 的富人占有全国 GDP 的 70% 的财富。他们都位居政经高位。其中有许多贪腐官员已成为黑社会的代言人和保护伞。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和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较量。决定胜负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全国人民迫切期盼的制定的“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也被置之高阁。这说明，权贵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成员及其代理人已经充塞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能够左右党的政策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可见，中国继续发展和前进的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及其高层。如果今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能清除垄断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成员及其代理人，今后中国的发展就只能以他们的利益为本。

《3》。『这些央企大多都拜中央（2009 年）四万亿元人民币救市方案之赐，因为这笔刺激经济的款项，九成由央企实施完成，而与此同时，银行大举授信力挺央企，今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 4.8 万亿元，当中八成投向大企业，仅央企下属地产公司就获得近 400 亿授信资金。此外，股

市也是央企套现的最佳途径，目前央企八成资产已经上市，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建筑 IPO、保利地产等一系列招股措施接连出台。

『属于央企的中化集团，旗下中化方兴投资管理公司，就经常以“大款”作风在土地拍卖会上举牌，对地价是否符合市场价格毫不理会，今年六月备受瞩目的北京广渠路 15 号地拍卖如期举行，中化方兴以 40.6 亿元拿下地王的大款作风，甚至连地产商 SOHO 的董事长潘石屹也为之咋舌。』^[11]

《4》。一半央企偷税。唯国税局能查央企的滥权行为。远不止如此，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税总局从今年 4 月开始对首批 24 家自查偷漏税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抽查，其中 12 家被查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企业的行政级别较高，各地税务稽查机关根本进不了企业集团的大门，只有国税总局统一组织才得以进行。

《5》。国企的官员是官商一体，其高管亦是高官，他们之中一些人在党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政府属于部长级或副部长级，他们现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决策起着导向或主导的作用。现在人大和政协已成为带着“先进代表”桂冠的富豪和贪官的俱乐部。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围绕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着明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展开的争论，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再次全面施展其能量，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诸如中国经济是否出现“拐点”，是否面临通胀，应否纠正“国进民退”，该不该拿出退市安排，结构如何调整，如何增收扩内需等尖锐的议题，都没有拿出答案。』^[12]

因此，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如国家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等，是中国最重要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大部分人们思想中存在着毛泽东时代对公有制迷信的流毒，误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也有自己的一份。

《6》。国有垄断企业是产生贪腐主要源头，特别是国有银行是连接官商贪腐的主要链条。今后只有打破国企垄断，才能使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在的关键和紧迫的任务在于大力扶植私有企业特别是私有银行。从长远来看，应该根据国情和需要，逐步将国有企业，转变或转卖为私有企业，使政府与产生利润的企业完全脱钩，完成政企分开和官商分开的彻底转型。在转变或转卖过程中，要有效地防止损害职工的权益和高层的贪腐。

《7》。国有垄断企业是 5 高 2 低 2 无的企业：5 高是高工薪、高红利、高贪腐、高浪费、^[12] 高消耗、2 低是低效率、低产出，2 无是无品牌无核心技术。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表示，反贪行动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央直属部门。中国国有媒体去年报道说，从 1998 年到 2006 年间的类似的全国性打击腐败运动中，共查出官员贪污人民币 1,406 亿元人民币（合 205 亿美元）。在这类案件中，主要是官员们贪污挪用公款。贺称这是孳生腐败的土壤。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 500 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 156 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 4 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 GDP 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8》。垄断不除产能过剩就难以根治。国有垄断企业是高贪腐高浪费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企业。而国有垄断企业的现任高管们几乎都在为了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和权利，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产能过剩。比如钢铁企业，对澳大利亚的高级铁矿石不能共同抵制，使外国公司可自由的抬高价格，对各自产品为了快速销售，又竞相压低价格。所以造成中国在国外“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现实。现在政府以发展高科技为名，动辄盲目地化数千亿元到处兴建高铁，到处炫耀中国高铁的公里数将达到世界的 1/2，问题在于；这些高铁的巨额建设费除了（10~20）%可能落入贪腐的高管的腰包之外，除了京沪高铁之外，其它的高铁恐怕都会与上海磁悬浮铁路一样，可能成为永无经济效益的摆设，新运行的武广高铁的空置率达到 40%。如果高铁继续以现有的速度发展，其收入将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这其实就是高贪腐高浪费的形象工程，就是一种产能过剩。

《9》。国有垄断企业中的高层是形成现今中国权贵垄断资本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成员，其中的许多中上层人物是买办卖国贼，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发家都靠暗中向外国公司或国家出卖政治经济利益或机密。已揭老底和被处死的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就是其中之一。商务部的周京毅案也是一例。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指责美国公司向中国中石油等3大公司行贿，中国政府调查后，否认了美国的指责。老百姓要相信谁呢？这个集团中有许多人可能是裸官，和陈水扁一样，将大量非法获得的财产转移到他们外国的亲属。因此，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和内奸。

【三】。所谓的公有制或者国有制，现在事实上已都演变成比封建制度好不了太多的家族式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集体占有制，

《1》。现在的国有企业实在是政府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将企业的资产和资金无赏的短期轮流地承包给某些特殊的权贵或买办精英，然后任由他们挥霍巧取豪夺。这种与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还不相同，农民在土地上还要投资，自负盈亏。而国企的这些高层官员不带给企业一分钱，赚了多落入他们的腰包，亏了由政府买单，他们完全都是在空手套白狼。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大捞一把然后走人，将财富转移并移民到国外。这就是为什么太子太妹们不愿意自己创业，而都愿意跑到国企当头头的原由。据报道，2009年，中国到美国的投资移民增加了1倍。他们赚钱越多，跑得越多。

《2》。国有企业的高管都是太上皇。『我们厂区的领导是地道的太上皇，在厂内差不多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义良知，一切唯领导的马首是瞻。我们单位稍微有点姿色的女职工，几乎都和领导有一腿。多数是主动投怀送抱，少数是领导利用职权逞强弄到手的，就算中央首长也不一定有我们领导风流快活。拍马屁的不仅仅是没廉耻的女人，知识分子也一样不甘示弱。单位评工程师、高工论文全靠抄袭，每篇论文都要把领导的名字挂在前面。』^[3] 使人异于奴隶的核心价值正是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人必须先有财产权才能保障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也完全符合经济地决定政治地位和文化精神需要的理论。而贫困的底层大众只能忍受宰割。

《3》。国有企业的高层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疯狂地贪腐和捞钱。『我在几家大国企干过，情况都差不多，都是‘不赚钱’而‘在捞钱’。国企除了垄断行业外，基本上多处于实质上的亏损状态，多靠贷款拨款维持。垄断大企业虽然眼前在大赚特赚，但本质上不是通过自己的业务“赚钱”，而是变相“捞钱”。因为垄断，就可无限制提高价格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就象石油价格一样，吃亏的是平民百姓，依旧是在向人民大众‘捞钱’……』^[3]

《4》。国有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压榨似于血汗工厂。『别以为只有沿海的私营企业存在‘血汗工厂’，国有企业就一定注重职工福利。我们公司也是知名的国有大企业，可一样存在无限制剥削工人的‘包身工’现象。领导们的待遇和职工相比就象赤道和南极相差那么巨大，实际收入差距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悬殊！那些资历较老的工人的工资福利也许还过得去，可对资历浅的工人则是赤裸裸的血汗压榨，并且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只因冲着‘国企’名头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将来有机会‘论资排辈’，他们才忍气吞声往前苦熬。我们单位的一个新项目招徕的新工人一个月就给400块钱，然后加班加点，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天休息时间，如果出了差错就使劲地扣钱……』^[3]

《5》。在垄断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到处都是独立王国，大王国内套小王国。各种大小独立王国都为了本单位和部门的利益互相斗争扯皮内耗，建立保护区和势力范围，以掠取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自肥。在垄断的国有企业里，政经合一，大官大富，小官小富。这还不算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因此，『今年以来，与特殊利益集团相关联的争论、事件，可谓层出不穷，遍地开花，从地方政府大开涨戒，从水到电等公用事业大加价，到垄断集团玩弄油荒、气荒之术，逼宫涨价；再到巨型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炒地，“地王”频现，最后是竞争性行业中，出现了“国进民退”潮。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翻云覆雨。』^[2]。

《6》。国企高管是“官”身，地位高，后台硬，政府不好管，也管不了。由于国企高管往往是自定薪酬等原因，难以控制他们的个人工资和红利总量。其一，要解决国企的垄断特权。国资委所管轄的央企中，垄断行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国企高薪的主要原因在于垄断，因此，针对国企的工资改革，重点要针对垄断，但现在的改革一直没有勇气打破垄断，这导致一些国企依然垄断着，高管们依然享受着高薪。其二，要约束国企高管的权力。国企高薪一方面是作为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过高，另一方面是高管工资过高。尽管有关方面早在 2003 年就开始治理国企高管“违规薪酬”，党纪、政令出了不少，但效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

【四】。分析和结论：中国现在已处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拐点”，今后将何去何从？

由于现在有些现政府的高官们争权势，表正统，又纷纷地“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说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面临“拐点”和“临界点”，而且也面临歧路、倒退和危机。现在中国贫富悬殊已造成了严重的对立，又刮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歪风，“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扩权和捞钱，左右政府的政策，企图退回到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老路。中国将何去何从？

《1》。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扩张和恶性膨胀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时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腐朽、垂死的垄断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此，中国现在大力维护和发展的权贵和买办为首的国有垄断企业，搞“国进民退”实际上就是在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与政府权力直接结合，能够操纵和控制政府权力和政策，而比私有垄断资本主义更贪婪、更具掠夺性，因而更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就是由于当时许多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际托拉斯为争夺殖民地而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所引起。”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希特勒的上台是由于他大搞福利社会这一非常超前的制度（二战后英法等欧洲国家才开始享受到），受到了德国当时劳工的普遍欢迎。纳粹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没收私人工厂，改组为国家工厂的行为，这是社会主义者常年的理想。这与中国的“国进民退”歪风相符。二战后美国所发动的各次战争都是为了军火、石油、金融等垄断集团的利益。

如果中国今后仍然长期坚持地继续无限地发展国有垄断企业，就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它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平等、公正、正义、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等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只要回头看看上面各节的事实和叙述，就完全可以看清中国现在国有垄断企业的真面目和本质。一旦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扩张和恶性膨胀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时，是不是也成为帝国主义？是不是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解释“革命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是否会因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恶性膨胀而发生革命？一些西方学者怀疑中国今后的“和平崛起”，而散布“中国威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中国自身，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这关键要看中国自己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未来中国能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能够在保护人权，发展民主法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福；如果中国像目前这样，在法治化、市场化方面反而有所倒退，那么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对世界是个祸，就像当年斯大林的崛起、甚至希特勒的崛起那样。』^[4]

《2》。只有民营企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是现代化国家的支柱。民营企业的繁荣昌盛才是民富的根源，是产生中产阶级，扩大内需，持续扩大就业的主要来源，是社

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在全国城乡各处发展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才能最后使农村市镇化，政府应该根据国情条件和需要将无必要的国有化企业在保障不损害职工利益的条件下转化为私有化和股份化企业。首先应该将国有商店如旅馆百货市场等等值地转卖给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孰优孰劣，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如果用同等的资金给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办相同的企业，使其互相竞争。肯定国有企业的纳税、就业人数和利润均会少于私人企业。因为私有企业主会对自己企业的得失成败负完全的责任，而国家企业的高管（特别是太子太妹和买办）几乎都是为了捞一把，即为了空手套白狼而来。

《3》。从长远看，只有党和政府转型，即只有从制度上彻底地将“政治经济分开”和“官商分开”才是民富国强、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之正道。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让私人去经商赚钱，政府成为公正廉明的执法者、管理者和服务者。现在中国这种亦官亦商的制度造成了“财富垄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贫富对立”。在改革开放的头 30 年，由于这种制度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资源办大事，搞基层经济建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 30 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在已形成权贵和买办“特殊利益集团”的条件下，今后如果仍然长期坚持实施这种制度，将国无宁日，会形成一个分裂的社会。。要做到党政转型的先决条件是共产党需先转型，即由“一党专政”党转型为执政党，从制度上和实际上改变“党大于法”和不“依法治国”的状况，从而改变官员“权大于法”的现实状况。

《4》。回到上面所说的前提，如果要想中国今后做到“以人为本”、“稳定持续地发展”、“民富国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就不要“空话治国”，以造成“空话误国”。而要坚持切实地、逐步有效地从制度上做到反对对“财富的垄断”和对“权力的垄断”。这是根本的唯一出路，即给国企高管予以正确的定位—官商分离。如果国企高管是“官”，他们的工薪就不应该超过最高官员的工薪。如果他们不是官，是大款，不管他们是“红色”、“白色”、“黑色”，一律都应该排除出党政高层，让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将企业做大做强，并接受政府执法机关的监督，无需他们花费时间、精力和任务去制定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利益政策和决策。没有必要给他们戴上“党中央委员”、“先进代表”、“人大政协委员”等桂冠。

《5》。因此，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实很简单，应该是：(a). 限制、反对、取消垄断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使国有垄断企业逐步增加私有股份，使国有股份逐步减少到次要成分，使董事会能够有效地按照法律和政策监督企业的管理。国家资金也要部分的购买私人垄断企业的股票，还要依法分割其垄断。(b). 大力发展私有制的中小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私人银行，即 大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c). 逐步完善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全体国民的生老病死、住房、教育、工作等 7 大项逐步得到保障和逐步完善。

因此，中国只有从现在起，逐步切实地实行反对、打击、取消国有垄断企业和权贵买办的“特殊利益集团”，彻底打破官商一体的少数家族“垄断财富”和“垄断权力”准封建制度，才能使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拐回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如果顽固地坚持现行的发展模式走下去，而中途所遇到的危机不能使其拐弯和改变发展模式的话，10 年之后，中国可能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国家（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完====

参考文献：

- [1]. 总算闹明白了：中央救市 4 万亿元部分竟是央企炒地本钱.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华盛顿人于 2009-12-17 08:42 编辑 www.backchina.com
- [2]. 中国的困扰：普遍、庞大、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评社 www.wenxuecity.com.2009-12-02
- [3]. 熊飞骏：国有企业内部的悲剧景观。 <http://www.kdnet.net>。二 00 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4]. 中国崛起惊天下，是福是祸是真是假？信源：美国之音 | 2009-12-20 | 网址：
<http://www.popyard.org>

The Real Estate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2019

Dongsheng Zhang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al estate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2019. [Academia Arena, 2010;2(3):16-31] (ISSN 1553-992X).

Keywords: real estate; China; capitalism

12/23/2009